
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

李 侃

抗日战争胜利,到现在已经整整 50 年了。1945 年不论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应该用金色的大字,写在本世纪的历史上,因为没有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局面。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的一次,也是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经受了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用生命和鲜血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雪洗了百年耻辱。

50 年后,当人们再来回顾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舍生忘死、为国捐躯的先烈,永远不会忘记英勇卓绝、浴血苦斗的亿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时,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人数很少,但为害甚大,为虎作伥,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他们踩着中国人民的血迹和白骨,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在侵略者面前奴颜婢膝,对人民耀武扬威。在这伙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之中,就有一个郑孝胥。

一个别样的封建遗老

曾经当过伪满洲傀儡政权的“国务总理”、“国务院总理大臣兼文教部大臣”的郑孝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需要从他当汉奸以

前的经历说起。

郑孝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人。1860年（咸丰十年）出生于官僚家庭。父郑守谦，进士出身，曾入翰林院，散馆后长期在吏部考功司任职，因久任京官，亲朋中颇多当时达官贵人。郑孝胥从幼年时起饱受传统封建教育，又很有文才，1882年（光绪八年）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以后虽曾应考会试，但终未能考中进士。1885年赴天津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营务处，办理洋务。在此期间郑孝胥往来京津，结识了严复、张謇、于式枚、李维格、沈渝庆、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等人，特别是在李鸿章幕中与严复关系甚密，并且为严复的儿子严璋教读，同时也颇受李鸿章的赏识。1889年充内阁中书，在京供职。1893年因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经方奏调，随赴日本，先后任筑地副领事和神户兼大阪领事。驻日期间，与日本政界和文人学者多所往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闭馆回国。12月，受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以江苏试用同知为洋务文案，不久又充任洋务局提调，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此期间，又结识了黄遵宪、赵凤昌、梁鼎芬、谭嗣同、汪康年、林旭、杨锐、陈三立、钱恂、志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郑孝胥曾颇感忧愤，“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①并与张之洞议论李鸿章说：“合肥入阁，乃渠一身之福。国家用合肥作北洋大臣二十余年，只算替日本用了，可叹！南皮为之失笑。”^②因郑氏颇谙洋务，交游很广，不但与张幕中许多重要幕僚过从甚密，还结交了不少维新人士。1898年8月，经已回湖广总督本任的张之洞奏荐，“奉旨”与钱恂“来京预备召见”。郑在由南京赴京途中经武汉，曾与张之洞谈论变法说：“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元（玄）黄颠沛，是非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又劝张之洞

① 《郑孝胥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第488页。

② 《日记》，第1册，第512页。

“俟伊藤博文来华，可荐为客卿”，“南皮甚震其论而不能用也”。^① 9月5日，受光绪召见。同日，刘光第、谭嗣同、杨锐、林旭赏四品卿衔。9日，奉“上谕”：“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②

郑氏曾拟上递《请设陆操公所折》，并草拟了《敬陈变法大要书》，但此时变法已近尾声，朝廷内外，山雨欲来。慈禧扑灭变法，再次垂帘，郑亦匆匆出京。11月再至武汉，被张之洞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并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郑孝胥虽然“奉旨”参与了变法，但他却与康梁等维新人士的变法主张格格不入。还在他被赏予候补道员的前三天，就曾与黄绍箕说过：“今有数学子，视纲常名教为迂阔，裂冠毁冕，悍然不顾，究其实际，毫无根柢，可笑人也。此曹不能成气候，而兴乱则有余，君其待之，胥当不幸而言中矣！”^③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非止一端。其中，如郑氏被光绪以维新变法有识之士破格召见，倚为羽翼，但他却以冷眼视维新，以必败看变法。表面看来，郑氏之言，果然“不幸而言中”，而再进一步思考，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不正是因为郑孝胥这样一类的人物，表面似主张维新，实则顽固守旧者麀入的缘故么！

1900年，与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的同时，自立军也在湖北等地起事。此时郑氏一面与盛宣怀密切联络，极力怂恿助成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订立《东南互保章程》，抵制义和团，维护帝国主义在长江以南的既得利益；一面又协助张之洞捕杀自立军。对此，他在当年8月2日的日记中，只记有“康党勾结会匪，将以明日举事”，“获唐才常、林澍堂及日本人甲斐君靖等凡二十余人”，“至营务处，会鞠会匪，斩十一人，唐才常与焉。”轻描淡写，草草带过。但据刘厚生所记，审讯时，唐才常向郑孝胥说：“你不是在戊戌年，皇

① 《日记》，第2册，第671页。

② 《日记》，第2册，第678页。

③ 《日记》，第2册，第677页。

上召见,赏给你一个道员,派你到总理衙门去的么?”郑说:是的。唐才常还语带讥刺,向郑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讨贼”起事的道理。郑尴尬地叫唐坐下,并表示没有资格对唐审讯,只有“陈明总督,声请回避”。后来在上海,郑孝胥曾向刘厚生当面承认,确有其事。^①

1903年6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郑氏出任两广洋务处督办和营务处总办。7月,任广西边防局督办,率军驻龙州。因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卖力,深受岑的赏识,岑曾表示:“将来西抚,舍子而谁?”由于得到张之洞、端方的支持,又将湖北武建军调往广西,委任郑氏为武建军统领,俨然成为广西军事首脑。他在广西任职二年多的时间里,对清廷在广西边防、军事、财政金融、教育事业等颇有建树。武建军的部下将领陆荣廷等,直到辛亥革命后成为地方军阀的时候,仍然对郑恭敬备至。后因在广西“剿匪”问题上,与岑春煊发生分歧,岑主严剿,郑主安抚,相持不下,遂报病力辞,虽经岑春煊、端方、李经羲等挽留,但其去志甚坚。1905年10月,遂由庄蕴宽接任督办,离广西赴上海。此时郑氏已拥有巨资,不但在上海修筑“海藏楼”以诗书自娱,而且投资于日辉制呢厂、商务印书馆、南通垦牧公司、北京自来水厂,并担任几家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1906年9月与张謇、李平书等成立宪政研究会,10月改名预备立宪公会,被选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立宪请愿运动失败后,于1910年被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聘为锦瑗铁路督办,对铁路借款、葫芦岛设港开埠有所谋划。1911年秋,被任为湖南布政使,接任次日,就被湖广总督瑞澂派赴北京,为清廷颁布外省官制,备内阁咨询。此时,四川保路运动发生,曾与盛宣怀密谋对策。端方率清军入川前,曾约郑氏同行,郑辞而未赴。不久,武昌起义,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郑已无官可做,又归上海。

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剧变,使郑孝胥的心情相当复杂波动,对中国形势、前途,以及其个人出处,曾在1911年10月7日由天津赴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101—102页。

上海船上的日记中写道：“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三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宕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① 他既寄希望于袁世凯保住清朝，又怕革命成功；既担心日本乘机侵夺中国，又恐日本无此实力。他预料中国将遭致外国瓜分，出现“以华人攻华人”的局面。他想以清朝遗老没世，又不甘心以诗赋徜徉于海藏楼。可悲的是，后来他自己却以前清遗老的姿态，从海藏楼跑出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了“以华人攻华人”的汉奸头目。

从辛亥革命到1923年郑孝胥以遗老身居上海，对共和国一直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他不但不做民国的官，而且连书法题词，写信作文，一律不用民国年号。不少人说他在上海做“寓公”，以“清高”自许。其实，此公却无时不在注视时局动向，终日奔走，多方联络，广通声气，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复辟帝制。此人既有资财，又有“文才”，既有政治野心，又有狡诈手段。在清末遗老群，可谓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因为他办过洋务，与晚清诸多封疆大吏、洋务首脑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盛宣怀等关系密切；又参与戊戌变法，与许多维新派人士、帝党官僚广为结纳；他本人又擅长诗词书法，文名甚盛。这样的条件，远非其他遗老所可比拟，而且他始终也不满足和甘心于“遗老”生活，时刻企图再干一番他所梦想的复辟“大业”。

郑氏在上海期间，与各界人物频繁接触，这些人物约略分之，

^① 《日记》，第3册，第1353页。

有这样几类：

一是政界人物：如程德全、岑春煊、熊希龄、唐绍仪等；二是实业界、文化界以及著名士绅：如张謇、汤寿潜、庄蕴宽、李平书、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陈三立、严复、蔡元培、孟森、章士钊、吴昌硕、周信芳等；三是清末遗老：如沈曾植、梁鼎芬、李经迈、姚文藻、朱祖谋、恽祖祁、康有为等。他同这些遗老，虽然气味相投，过从甚密，并组织“读经会”和壬午乡试同年“一元会”，这些遗老们平时集会，虽然在思古恋旧、诋斥时政，但并不明言复辟。真密谋复辟的只有郑孝胥、姚文藻、沈曾植等一部分人。以郑为核心的复辟分子，还与在青岛的溥伟、刘廷琛、胡嗣瑗、劳乃宣，大连的善耆，以及往来于青岛和日本之间的升允互通声气，密谋策划。与此同时，郑本人或通过姚文藻的穿针引线，同日本的军政人物、外交官员以及间谍、浪人等关系甚密。而其长子，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郑垂，又是充当他与日本各色侵华分子勾结的得力帮手。

郑孝胥虽然没有到北京去直接参加1917年的张勋复辟，但是他在上海却积极参与此项活动，不但对张勋寄予希望，称赞不已，而且为复辟费尽心机。这次复辟很快失败，一些发动和参加复辟的军阀和遗老，均遭唾弃嘲笑，有的还被“惩办”，从此一蹶不振。郑孝胥虽然也因复辟失败而沮丧，骂张勋无能，怨升允失算。但他自己却未受到任何损伤，依然安坐海藏楼，写字作诗，会友看戏，过他的文人雅士和遗老生活。就在他韬光养晦、伺机而动的时候，1917年7月24日，忽由陆荣廷交人转送溥仪为他亲笔写的“贞风凌俗”匾额一方。^①郑氏对此，感激不尽。其实这原是不久前陆荣廷到北京叩见溥仪时，“因报效万元为陵工种树之用，并称，中有四千元为郑孝胥托令代呈（陆过沪时曾欲赠郑氏四千元，郑未受），陆遂获赐珍物、福字等件，上又特赐孝胥此匾，命荣廷带交。”^②在此期间，郑氏

① 《日记》，第3册，第1674页。

② 《日记》，第3册，第1697、1698页。

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愈紧,并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1918年3月9日,他在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教头森茂和新桥荣次郎谈话中,明确表示,复辟和统一中国“非兵力不能”,“明目张胆斥共和者为乱臣贼子,则吾能为之,惜无力耳”。“使日本能助我军械、兵力,则吾力可以渐展”。当对方表示:“日政府究不知中国主张复辟者更有何人,何以助之?”的时候,郑立即回答:“此我之责也。伺机会生时,吾当求助于日本,虽不济,亦不以为耻。”^① 郑孝胥既然有如此明白的表示,他也就自然会成为日本侵华活动中特别值得依靠和利用的人物。

1923年8月,郑氏被溥仪初次召见时,即给溥留下了良好印象。12月,由于陈宝琛推荐,决定入宫供职。1924年2月,溥仪面谕:“将令尔管理内务府,将以金梁助尔。”3月3日,由陈宝琛“传谕”:“特派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畀以全权,以资整顿。”“郑孝胥加恩赏头品顶戴。”^② 郑氏本想趁此机会,在小朝廷中大显身手,对“内务府”的种种积弊,整顿改革,并为“清理财政”、裁减人员等事宜拟订“筹备说帖”,成立筹备处。但是,长期寄生于小朝廷的皇族贵戚,却满腹怨言,百般抵制。郑氏无法整顿,只好撤销“筹备处”,并于6月间以报病“奏请开缺”。溥仪只得下令:“著开去总理内务府大臣之缺,仍在懋勤殿行走,俾得随时襄赞。”^③ 从此,郑氏虽然丢了“总理内务府大臣”的头衔,却进一步成为溥仪的智囊心腹。

1924年11月2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等仓惶逃至醇亲王府,不久,经郑孝胥与日本驻军竹本多吉大佐商定,溥仪潜离醇王府,经德国医院,由郑陪同逃入日本使馆。当日风沙很大,郑氏自认为这是生平一大快事,并以“护驾”猛士自许,

① 《日记》,第3册,第1716页。

② 《日记》,第4册,第1983—1987页。

③ 《日记》,第4册,第2005页。

作诗二首,其中一首云:“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①此后,郑氏曾回上海暂住。

1925年2月23日,溥仪由日本驻华使馆保护,自北京出走天津,暂住张园,后移居静园。郑孝胥得到溥仪的电报催促,于27日由沪赴津。此后,直到溥仪在伪满称帝以前,郑一直称溥仪住处为“行在”。3月5日,溥仪“下旨”:“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栻、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并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②溥仪和郑孝胥等在天津的七年中,企图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人支持,同时又收买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流亡股匪,为其效力;另一方面则加紧与日本历任驻军司令官、历任领事和来华日本各界人物的联系,极力希望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支持。溥仪很想到日本“游历”求援,郑氏对此表示反对,他屡劝溥仪静观世变,养晦待时,“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复兴之望绝矣”。又说:“自古中兴之主必藉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启衅端,其害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他还建议编纂《本朝列圣治国大事》,并译成英文,“流播于各国”,如此,“则四海万国,皆知我清功德自东周以来无能及者,不啻以数百万兵力,鼓行而入中原”。^③

溥仪留居天津期间,郑孝胥经常到“行在”“进讲”,为溥仪出谋献策,溥对“总管外务处”的郑孝胥几乎形影不离,言听计从。而“承办外务”的郑垂,又同日本侵略势力串通一气,并在溥仪与日本侵华机构和军政人物之间穿针引线。一心想望复辟的溥仪,与郑孝胥的关系,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② 《日记》,第4册,第2044页。

③ 《日记》,第4册,第2194、2195页。

种程度”。^①

1928年9月21日至10月26日,郑孝胥经与溥仪商议,并取得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作为溥仪的代表,经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联络安排,偕其长子郑垂访问日本。在日本访问期间,郑孝胥除游山玩水、大讲孔孟之道而外,更重要的是频繁会见了日本军政要人,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高田丰树、有田八郎、吉田茂、小田切万之助、水野晓梅等人。此外,他还会见了许多政客和所谓学者文人,以及黑龙会的人物佃信夫、岩田爱之助等。当时,日本的参谋总长铃木贯太郎向郑询问溥仪情况,并问及“有恢复之志否”时,参谋次长南次郎立即补充说:“如有所求,可以见语。”郑孝胥回答说:“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求。”^②这次访问,不但加深了与日本侵华势力的勾结,也为日后投靠日本铺平了道路。

蓄谋已久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和郑孝胥父子一伙认为“出头”的时机已到,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和导演之下,一场可耻的傀儡政治丑剧开场了。

傀儡“国务总理”的得意和悲哀

日本侵略者随着九一八的炮声,撕裂了中国大地,把东北河山和东北人民推进了血海地狱。而这时蜷伏在天津的郑孝胥和溥仪,顿时活跃起来。事变的第二天,他们即派刘骥业赴大连,去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又派郑垂去日本领事馆探问消息。此时,素以与日本渊源甚深的另一个遗老罗振玉,也不甘寂寞,自告奋勇与日本侵略势力奔走联络,并要求溥仪予以“手谕”,使他“便宜行事”。罗显然是要争夺依靠日本、图谋复辟的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42页。

② 《日记》,第4册,第2198—2207页。

首功。面对这个对手的举动,郑孝胥却冷静地对溥仪说:“天时人事,展转相乘,至有今日,愿以定静处之,躁进者进用,必损威名,宜以敬慎相戒。”^① 这时他按捺不住对共和、“共产”的仇恨,在1931年10月10日抒发他的政见和“理想”时写道:“彼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亡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中国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 计亚洲中有权力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 安乎,不安乎? 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 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吾意,共和、共产之后将入共管,而不能成者,赖有此一人耳。此事果成,诚世界人类之福利,种族、国际之恶果皆将消灭于无形之中,视举世之非战条约、苦求和平者,其效力可加至千百倍。孔孟仁义之说必盛行于世。”^② 对他的这套理论主张,连陈宝琛也不以为然,讥之为“慷他人之慨”。郑孝胥闻言,也以老迈昏庸,“徒有慷慨而不能自为”反唇相讥。

1931年10月11日,急于复辟的溥仪,采纳郑孝胥的意见,派家庭教师远山猛雄持他的亲笔信回日本,向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头面人物,探询他们对溥仪复辟的态度。11月2日,关东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去天津夜见溥仪。在会见以前,郑孝胥对溥仪表示:“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长,乃关东军之要人,果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③ 土肥原在与溥仪会见时,以关东军代表的姿态,希望溥仪做即将成立的“国家元首”,并且表示这个“国家”当然是“帝国”。于是,溥仪立刻兴奋起来,对郑孝胥也更加信任。但是,在是否投靠关东军问题上,“行在”内部却发生了

① 《日记》,第4册,第2343页。

② 《日记》,第4册,第2344、2345页。

③ 《日记》,第4册,第2349页。

严重分歧。在11月5日“静园”的一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个反对,一个赞成。胡嗣瑗、铁良、袁大化等虽然倾向于陈宝琛,但在郑孝胥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不敢明言。事后,郑对溥仪说:“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①

在土肥原和天津的日本驻军以及日本租界当局的策划布置下,1931年11月10日晚,溥仪和郑孝胥父子,在日本军人上角利一、浪人工藤铁三郎等人的护持下,偷渡白河,逃出天津,在大沽口外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于3日晨到达营口。^②

溥仪和郑孝胥父子潜赴东北之前,东北三省的汉奸头目已经纷纷出台表演,辽宁的赵欣伯、于冲汉、袁金铠、阙朝玺等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后又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由于这些汉奸名声太坏,丑态百出,关东军令其解散,又在威胁利诱之下,招降了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出任奉天省长,并由日本人金井章次为顾问,全省行政、财经、司法大权,全掌握在日人顾问手中。清帝宗室、宗社党头目、老牌亲日分子熙洽,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叛国投敌,自任“吉林省长公署长官”,吉林全省沦入敌手。黑龙江的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在坂垣征四郎的拉拢下,投敌叛国。1932年1月1日,发表黑龙江“独立宣言”,并一度与日本关东军合谋诱降马占山。此外,于冲汉还在本庄繁的指使下,成立了“自治指导部”,为日本侵略者奔走效劳。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东北的急先锋关东军,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群奸割据的局面,它需要制造一个“统一”东北的傀儡政权。于是,怎样安排溥仪成为这个傀儡政权的首脑;对郑孝胥和东北三省的汉奸头目,又如何加官晋爵,就要煞费周章,而已经抵达东北的溥仪和郑孝胥父子,也迫不及待地想知

① 《日记》,第4册,第2350页。

②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7—289页对潜赴东北经过记述甚详,《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351页亦有记载。

道自己的位置和出处。

溥仪和郑孝胥在营口并没有看到他们意想中的欢迎场面,而是由一个原日本宪兵大尉杀人犯魔怪式的人物甘粕正彦从营口带到了海城汤岗子温泉。在这里,他除了郑氏父子和已等候在此的罗振玉、佟济煦、商衍瀛之外,实际上是被封锁起来了,因为这时日本的国际处境不利,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在怎样设计傀儡政权,以及在利用溥仪的方式上,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溥仪在汤岗子住了一周之后,又被移到旅顺大和旅馆去了。就在溥仪神魂不定之时,郑孝胥和罗振玉却在日本主子面前,展开了对溥仪的争夺。“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① 罗振玉自恃与板垣、上角早有密谋,以为必操胜券,但是郑氏父子却比罗更胜一筹,他们不但与日本侵华势力渊源更深,而且一到东北就见机行事,很快就斗败了罗振玉。罗虽然与日本有旧,在甲骨古董方面造诣甚深,但对于搞政治,则不论资历、手段,还是与溥仪的关系,都与郑相去甚远。

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急于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成立“满蒙中央政府”,于是加紧策划。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根据本庄繁的指示,向天皇报告策划内容,遂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共同制定《满洲问题处理方案纲要》。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石原莞尔、松井石根、片仓衷和土肥原、花谷等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对建立所谓“满洲国”进行具体策划。此前,板垣还就建立伪政权问题在沈阳与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谢介石等密谈,要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效劳。2月16日,在三宅、板垣和顾问驹井德三等人的操纵控制下,又纠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95页。

马占山举行“四巨头建国会议”。17日,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任会长。18日,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在旅顺等候了三个月的溥仪,于19日知道了这个消息,顿时如冷水浇头,气急败坏,满心希望复辟称帝的梦想濒于破灭。

2月20日,溥仪把住在大连的郑孝胥召到旅顺,写了十二条意见,要郑带给板垣,中心是哀求关东军当局允许他复辟称帝,以“正系统”。郑孝胥在溥仪面前表示,他见到板垣等人时的“措词大略”是:“共和,则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唯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议国号、年号,则告以国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①21日,郑孝胥父子及罗振玉带着溥仪交付的“我方既定办法,决不变更,且详为释导,以破群疑”的使命,到奉天参加会议。郑当晚即面见板垣,但并未提出溥仪的十二条意见。22日,板垣向郑“示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郑又“至行政委员会旁听”东北三省汉奸们及内蒙投敌分子关于所谓“国体”的争论。23日郑孝胥返回旅顺,在向溥仪“复命”时,“极言当借力试行”^②,实际上就是劝溥仪接受板垣关于“满洲国”的设计方案。同一天,板垣也到旅顺面见溥仪。次日,溥仪对“板垣所示立国制度名曰民本制,国曰满洲国,君主曰临时执政,年号曰建国”的方案中的“民本制及临时执政二事未答”,仍坚持不放弃皇帝身份,并表示担任临时执政“以一年为期”。板垣对溥仪的态度极为不满,表示日本军部的要求不能更改。当晚郑孝胥即令郑垂向溥仪建议:“与日本司令部所请制度不必争辩”。在郑垂的反复“说服”之下,溥仪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并将“一年为期”改为“暂时维持”。“板垣退而大悦”。郑孝胥在日记中形容这次关键性的决定说:“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

① 《日记》,第5册,第2366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367页。

策败矣。”^①

经过关东军的策划导演和汉奸群丑们献媚争宠,1931年3月1日,以张景惠为头目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所谓“建国宣言”,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清、凌升、苏宝麟等,又以“各界代表”身份到旅顺“恳请溥仪出任‘执政’”。经一“请”再“请”和一“让”再“让”的表演之后,3月5日,又经张景惠等汉奸“要人”再三“恳请”,溥仪才表示同意。6日晚,郑孝胥“与板垣商定参议府、国务院名单进呈”。8日,溥仪和郑孝胥一伙在张景惠、熙洽及甘粕正彦、上角利一等陪同下,赶赴长春。9日,举行“伪满洲国”“建国”和“执政”就职仪式。傀儡政权的策划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专程来贺“执政即位”,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宣告成立。同一天“特任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颁布各部“总长”、各省省长的任命。傀儡政权的头目们在关东军的卵翼下,粉墨登场。

伴随溥仪将近十年,朝思暮想扶保“宣统皇帝”重登大宝、入阁拜相的郑孝胥,这时被日本“皇军”扶上了“总理”宝座,虽然有违复辟初衷,但总算不枉十年苦心。于是,他颇有些得意忘形,以为日本主子真的会允许他和溥仪以“仁义道德”立国,把东北变成“王道乐土”。3月13日,他在草拟的一份“国务院布告”中,发表政见说:“土地、人民、政事,合之而成国家。政事废弛则人民凋敝,人民凋敝则土地荒芜,此即今日国内之景象也。国家之患莫大于排外。有土地之富而不能自营,宁听其荒旷不许外人之合作,因此而开兵端,因此以致内乱,犹愤之曰:‘他人欺我!’岂知据万里之沃壤而闭塞之,此乃天道之所不容,其不能自保决矣。为今之计,唯有开放门户,招来合作,为立国之本策,使吾国每年可集数千万之资本,每年可增数百万之人民,尽弃猜疑,尽除阻梗,则天开地辟之变化,不出

① 《日记》,第5册,第2367、2368页。

数年,必成为富丽庄严之世界。”^① 这个在“开放门户”掩盖下的卖国理论,是他“共爱论”的解释和发挥,其中也隐含着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的“开放”。郑孝胥错误地理解了日本占领东北初期,为了外交上的需要,曾标榜“门户开放”的意图。岂知这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既定国策完全相背的。就在他洋洋得意地抒发自己理论主张的前一天,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即决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及《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前者提出:“驻满帝国陆军须相应地增加兵力,并拥有必要的海军设施,不允许新国家正规陆军的存在”。“新国家治安维持机关的建立和改进,尤应以日本人充任其领导核心”。“为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后者提出:“关于新国家与帝国及第三国之关系问题,应使新国家……阐明恪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方针,借以防止来自别国的阻挠。”“关于外交及内政的实权掌握问题,初期尽可能采用少数日本人担任官吏或顾问,逐步加以充实。”同时还通令“派出之帝国官宪,使其对新国家进行彻底指导”。^② 此后,日本内阁、关东军司令部,又连续制定了控制“满洲国”的具体措施。1932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国指导要领(草案)》更明确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指导满洲国政府。此外,关于外交手续,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此外,它对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对外关系、铁路交通、产业开发等都作了由日本控制的规定。^③ 这个由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起草的“草案”,虽

① 《日记》,第5册,第2371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册《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第4—6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册《伪满傀儡政权》,第17、18页。

经陆军省和关东军磋商修改,但基本内容未变,于1933年8月经日本内阁决定,形成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将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力,都完全置于关东军的严格控制之下,整个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郑孝胥深知,不论是“满洲国”的“执政”溥仪,还是他这“国务院总理”,都是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安排和操纵摆布的。他要想保住这个奴隶“总管”的位置,就必须完全顺从日本主人的意志,并且取得关东军这个靠山的信任和欢心。因此,他对炮制“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灵魂人物板垣征四郎,特别是对在他“总理”任内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等,都表示了格外亲密的恭敬。尽管他这个“国务院总理”实际不过是一个摆设,实权完全操在“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手里,他还是官瘾大发,上任之初几乎每天都要去“国务院”“主持国务会议”,并且经常往来于“执政”溥仪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同时还要不断会见来访的日本各色人等,接待来谋“差事”的一些遗老的没落子弟,利用一切机会宣扬“王道”。他简直成了“满洲国”汉奸集团中的头号红人和头号忙人。特别使郑孝胥得意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郑垂和郑禹,被“特任为执政府洋文秘书”。当时的《满洲日报》对此发表以肉麻当有趣的评论说:“犬养毅为日本首相,其子健为秘书;郑孝胥为满洲首相,其子垂亦为秘书。相对辉映,其中日亲善之真象乎!”^①而根据溥仪出于复辟的需要,早将其二妹许配于郑孝胥长孙为妻的政治姻亲,这时也在溥仪“御前”“奉旨”结婚。^②伪满“总理”、“皇亲国戚”,再加上关东军的得力宠物,郑孝胥在沦亡于日本的中国东北大地,大有声势显赫,不可一世的气焰了。

日本侵略势力,既然煞费苦心地豢养和扶植了一批汉奸傀儡,对他们“论功行赏”,那么汉奸们也就必须按着主人的颐指气使,为

① 《日记》,第5册,第2370、2375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378页。

其奔走效劳。身为傀儡总理的郑孝胥，自然更有他的特殊用场。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不顾“国联”和西方各国的反对，悍然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此之前的8月15日，已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厅长官和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中文本为《满日议定书》）。《议定书》规定：“满洲国”承认和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包括以往日中两国条约、协定、其他条款及公私契约等规定的权益；日满两个缔约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之内。这样，就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满洲国”名为独立，实则是日本殖民地的地位。而这个《议定书》的附件即1932年3月10日溥仪签字画押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更规定：“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口、水路、航空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此外，还规定“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可任用日本人，其人选并须经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①在《日满议定书》公布时，这个附件因为太苛刻露骨而没有公布。在郑孝胥与武藤信义签署这个卖国文书的当天晚上，溥仪和郑孝胥等宴请武藤的宴席上，郑孝胥即席向武藤献诗曰：“巧历难逢三五夜，万家灯火共欢声，凭公扫尽浮云影，才信中秋分外明。”^②

在《日满议定书》签订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加紧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举凡铁路交通、矿山资源开发、钢铁煤炭、电力邮政、农业林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由日本侵略者牢牢控制，而“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在媚日卖国方面也按照日本当局的意旨，驯服慷慨，尽心尽力。1933年7月27日，武藤信义暴死，其职务由菱刈隆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册《伪满傀儡政权》，第3—4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408页。

大将继任。郑孝胥在怀恋旧主的同时,又笑迎新主。而菱刈隆的政治手腕不下武藤,也把郑孝胥视为“知己”,在9月5日菱刈为他举行的祝寿宴会上,郑孝胥举杯献媚说:“满洲建国,如入新春。本庄时,为正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之时也。武藤时,为二月,桃始华、仓庚鸣之时也。菱刈大使之来,其为春三月乎!桐花鼠化,虹见萍生,此正芳春佳日,士女行乐,欢声载道,今其时矣。愿假一觴,为座中寿!”^①他简直把侵华急先锋历届关东军司令官,视作泽及万民的春风化雨,而感恩戴德。这就是郑孝胥的汉奸嘴脸和丑恶灵魂。

那么,郑孝胥与日本侵略者的大小主子之间,就没有任何摩擦与矛盾,在得意之中就没有任何苦恼吗?也不尽然。主奴之间,往往也会发生齟齬与争吵的。这里可以举出如下事例。

在郑孝胥被特任为“国务院总理”的同时,就根据关东军的决定,任命关东军统治部长、特务部长,与板垣共同策划伪满洲国的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即实际上握有实权的“太上总理”。驹井此人不但狂傲矫横,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根本不把郑孝胥和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1932年3月12日在第三次“国务会议”决定任命日本人为局长、处长时,“熙洽、张燕卿、丁鉴修颇有异议,驹井争之乃罢”。^②后又因为“日系官吏薪金待遇”高于“满系官吏”过多,熙洽自恃与关东军关系很深,又献降吉林有功,起而争辩,出语不恭,结果被驹井厉声吓止。郑孝胥也对“日满官吏,偏重不均,今国务院满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百数人”表示不满,但他在关东军面前,仍然百依百顺,对驹井德三也是心怀怨怼而不敢明言,而在溥仪面前却往往挟关东军以自重。本庄繁离任前要郑孝胥在两个《协约》上签字(8月17日),“板垣及后宫淳大佐以铁道、水道、航空将来归日本代管,以收入之款清还军费,协约二通,来求签字,即签与之。因本庄将去,其经手事件必欲定

① 《日记》,第5册,第2481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370页。

议,以践汤岗子之约。”^①此事虽然在1931年3月溥仪与本庄繁的秘密换文中已有原则协议,但郑孝胥这次在两个“协议”上签字时却未向溥仪请示。这使溥仪十分恼火,又加素来对郑孝胥父子不满的胡嗣瑗,屡向溥仪进言,说郑孝胥专横擅断。于是溥仪一方面派人到东京探听日本军部和政府对“满洲国”的政策和态度,同时也准备以臧式毅取代郑孝胥。而这个密谋消息却被耳目灵通的郑垂知道了。郑垂以半探问半威胁的口吻,向溥仪说了此事,于是更增加了溥仪对郑氏父子的不满。郑孝胥于9月2日以“欲乘日本军人换防之际,察上下之舆论信否;容隐处此,徒糜岁月”为由,“诣行在,辞国务总理职”。更令郑孝胥气恼的,是他请求“辞出”的第二天,驹井德三通知他“郑垂秘书已撤销,郑禹改为总务厅秘书。”郑孝胥闻言大惊,愤愤地对驹井说:“郑垂、郑禹本皆执政府秘书。吾任总理,执政特任改为总理秘书。敦能撤之?吾已辞职,二子将同辞,无所用改矣!”^②事后郑又大骂:“驹井德三者,不学妄人,戕贼王道,而纵容庇护,使得结党恣睢,横行于满洲,乃本庄之罪也。本庄颇贤,以此为玷。郑垂信板垣之言,荐之使为总务厅长官,彼乃忌郑垂,欲逐之。”^③在《日满议定书》签字后,经武藤与板垣几经调解,任命郑垂为航空会社总裁,“改正政府组织法,以各部总长副署。废国务院总务长官,设厅长,驹井德三为参议”。^④于是,这一主奴之间的纠纷宣告平息,郑孝胥又继当“总理”,不久,远藤柳作继任总务厅长。

另一件事是关于“协和党”改为“协和会”的问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片仓衷等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考虑筹划成立“一个能成为满洲国的推动力,捍卫它、扶植它的强有力的政党”,并“初步拟定了《满洲国协和党方案》,吸

① 《日记》,第5册,第2401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405页。

③ 《日记》,第5册,第2405—2406页。

④ 《日记》,第5册,第2413页。

收自九一八事变前即主张成立满蒙独立国,并始终坚持活动的满洲青年联盟、大雄锋会及一般志愿参加者”,经过共同协商,成立了以板垣、片仓、张燕卿、谢介石、于静远等人为骨干的“创立筹备委员会”,于1932年4月初在沈阳着手筹备。同时,板垣将此事告知郑孝胥,要他征求溥仪的意见。4月15日,郑孝胥在向溥仪谈到此事时,溥仪表示“以党专制,不如大公得众”。郑对溥仪的看法也认为“有定见,甚可喜”。^①紧接着板垣、片仓又向郑孝胥谈起建立“协和党”事情,郑对板垣说:“孔教不党,王道无党。若以学会及合资公司为先,则异端必不能为害矣。”郑“力言其不可”。^②又经过多次磋商,最后溥仪“召见”郑孝胥、板垣、驹井等,议定把“协和党”改称“协和会”。7月15日,“协和会”成立,任郑孝胥为会长,并作了一篇《协和会说》。溥仪为“协和会”的名誉总裁,本庄繁为名誉顾问。溥仪在成立会上致词说:“鉴于政党已不适合于今之时代,故设本会,以谋求民族协和,振兴百业……望能不偏不倚,以诚以信,思想一致,生业互相扶持,国家之前途皆有赖于此。”^③表面上看,由于溥仪和郑孝胥的抵制和反对,“协和党”改为“协和会”,是他们一次心理上的满足,但是所谓“协和会”,其实正是“日满协和”的招牌下,日本侵略者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奴化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

日本侵略者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和殖民统治,伪满洲国的“执政”和“国务院”已经完全成为它手中任意摆布的傀儡。但是为进一步满足溥仪当皇帝的梦想和安抚一帮渴望复辟充当“帝国元勋”的汉奸头目,决计把溥仪由“执政”升格为“皇帝”,“总长”们也升格为“大臣”。根据日本统治者的意图,1933年10月19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与郑孝胥商谈“上尊号事”。20日,郑又为改行帝制问

① 《日记》,第5册,第2377页,前揭书,《伪满傀儡政权》,第561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379页。

③ 前揭书,《伪满傀儡政权》,第564页。

题走访菱刈隆。12月19日，菱刈向郑孝胥“言满洲宜为帝国，请执政以明年三月朔即帝位，百官劝进，上尊号曰大满洲国皇帝”。郑虽然同意，但私下对顾问宇佐美说：“唯欲求大清复辟者以为不屑耳！”他在菱刈、远藤、小矶等说明改执政为皇帝并非清朝复辟后，立起发言说，溥仪“流离颠沛逾二十年，我等痛心腐骨，复辟之谋未尝暂辍。幸日本援助，满洲建国，一年以来，国内渐安。今议即位，于我等诸臣已恨其晚矣！”^①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虽然不是清室复辟，但这一举措也使溥仪和郑孝胥等一班汉奸们皆大欢喜。于是，以郑孝胥为首的群丑们顿时兴奋忙碌起来，拟“诏书”，议“年号”，备“祭天”，拟“劝进”，制“玉玺”，为筹备“登极大典”煞费苦心。“总务厅送来大典预算二百四十余万元”，郑孝胥为讨好日本主人，告诉远藤柳作，“可增抚恤日军战死者家族及战阵受伤残废者，以一百万元为度”。^②1934年3月1日，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伪政权群丑及一些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原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郑孝胥所拟十余个年号都未被采纳，而由溥仪自定为“康德”。于是“执政”改称“皇帝”，“大同三年”改为“康德元年”，郑孝胥的“国务总理”也改称“国务总理大臣”了。3月22日，这位“亲任总理大臣”开始访日之行。在日本访问的一个月中，他除了向日本天皇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朝拜外，还遍访日本军政其他要人，宣扬“日满协和”，“门户开放”，表示“当使日满亲如骨肉，乃足以报其亲善之诚意”。^③至此，郑孝胥已经完成了日本侵略者希望他所能完成的汉奸使命，他自己虽然梦想活到一百岁，把“总理大臣”做到八十五岁，然而，在日本主人眼中他的价值和作用却日趋跌落。1934年12月南次郎取代菱刈隆的职务后，他虽然仍想靠这位“老朋友”的支持，再拼老命，为“友邦”日本效

① 《日记》，第5册，第2498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503页。

③ 《日记》，第5册，第2522页。

劳,但处境却日趋冷落了。除了在一些日本指定的文件上签字和接待日本人来访,以及讲“王道”、作书法之外,已经再无事可做。待1935年5月溥仪访问日本归来,“日满一体”的体制彻底完成,日本侵略者早已决定“总理大臣”换马。1935年5月3日,南次郎与郑孝胥商谈“内阁改选,现政府全体辞职,荐蔡运升为国务总理”问题。^①5月21日,根据日本当局的意旨,郑孝胥向溥仪辞去“总理”职务,其职改由张景惠继任。当晚,郑对其次子郑禹说:“吾忆平生,辞边防、裁督办、抵上海,一乐也;以上出德医院,入日本使馆,二乐也;今建满洲国,任事三年,辞总理,三乐也。从此以后,终不入官,乐亦足矣!”这既是郑氏强作笑颜、无可奈何的表白与自慰,也是狡兔走狗心情的自怨自艾。郑氏下野第二天,以诗自解道:“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虽曰非健儿,亦未齿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屈伸数张臂,嘘啸频撮口。千秋寒酸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复论谁某。”^②过了一个多月,与其积怨甚深,曾被他讥为“千秋寒酸徒”,“营营鼠窟中”的胡嗣瑗也以诗讥曰:“奇计平生总自欺,怒撞玉斗是何辞!尸居久冒阿衡任,距脱应传圣德诗……明明十二年来事,天地包容竟未知。”^③退职时,溥仪虽然给他“建国恩赏金公债四十万元,国币二十万元”,但他仍然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他对一个叫成田努的日本人:“此次如以蔡为总理,满洲人必信日本为举贤任能;而以张景惠为总理,则群疑利用张之不识字而已,如能再用蔡运升为总理,以品川主计为总务厅长,日满之相亲,必无憾矣!”^④但此时他已经被日本主子一脚踢开,虽然想再为“日满相亲”尽力划策,但已经心劳日拙,无计可施了。此后,他就以讲“王道和作诗写字过着”傀儡遗老生活。在养尊处优的无聊之余,他也有过“退引南归”的念头,曾作诗说:“自诩知微且见几,聊将聚饮

① 《日记》,第5册,第2581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583页。

③ 《日记》,第5册,第2590页。

④ 《日记》,第5册,第2592页。

卜南归。江湖粗办鱼羹饭,所幸君恩听拂衣。”^①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即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他竟然讴歌日本的大举侵华为“伐罪吊民”,并梦想将与“皇帝入关”。1937年11月至12月,他在日本浪人太田万世雄的陪同下一度回北平、天津,除了与在平遗老叙旧看戏外,还拜访了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和其他官员,并且与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王克敏、朱深、董康等会面。他虽然要为日本主子效忠到底,然而,此时的郑孝胥已将成为冢中枯骨,而且历史已经注定要把他的名字永远刻在耻辱柱上。1938年3月28日,这个自命不凡,为功名利禄奔走一生,最后甘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鹰犬的郑孝胥终于了结了可耻的生命,时年78岁。

郑记“王道”和日本武士道

对日本侵略者卖身投靠,当上傀儡“总理”的郑孝胥,始终以孔孟之徒自命。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军刀和烧杀抢掠面前,反复宣扬他们“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声言要同日本“一德一心”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王道乐土”。不过,他的“王道”,不但具有明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媚外性和奴才性。

1932年7月19日,他给来访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王道之大意”说:“爱国之思想、军国民之教育,皆足酿成世界战祸,王道则不主爱国而主博爱,不用军国教育,而用礼义教育。”^②第二天,他开始撰写《王道要义》,把孔孟之道与他的卖国理论搅在一起,恣意发挥说:“当世列国所用以造成国民之思想者,岂不曰爱国乎?所以用以养成国民之能事者,岂不曰军国民之教育乎?各国所以练习其国民者,唯恐落于人后。岂知爱国之宗旨即为仇外之对象,军国民之资格,即为备战之先声。此皆建成图霸之策,而世界之

① 《日记》,第5册,第2623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396页。

战祸已酿成于习惯之中，种因得果，不至于破坏治安，戕灭人类不止。”“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民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① 他在担任伪满洲国傀儡“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作讲演、作“训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作为自己的“杰作”广为印发，对来访者赠送。而每讲“王道”，他必宣扬“满日两国，志同道合”，攻击中国，恭维日本。说什么“中国日本国，同在亚洲，以前历史上，全是旧道德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变法维新，政治与战功，得了世界的大名誉，我以为日本因有旧道德做了根本，所以能成如此大功业。中国二十年以来，本有的旧道德全被共和、共产两党破坏尽了，所以也得了国破家亡的报应。现在满洲国成立，速将旧道德提倡，洗尽共和和共产的流毒，将来满日两国，自然是志同道合的了。”^② 在他看来，中国被弄得“国破家亡”全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因为“破坏”了旧道德。只有靠日本与“满洲国”的“志同道合”才能得救。可见，一个民族良知完全泯灭，以敌为友，认贼作父的人，尽管他满口仁义道德、忠信礼义，也只能自我暴露汉奸嘴脸。

郑孝胥的“王道”理论，虽然连篇累牍，但翻来覆去，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思想“理论”，就是卖国投敌、“日满协和”，既合乎“王道”，也合乎潮流。而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初期，他的这种卖国理论，也还暂时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夸奖，把它作为欺骗世人的舆论。1932年8月，平沼骐一郎写信给郑孝胥说：“惟阁下膺重职，营谋百为，敝邦人士，引颈相望，争睹新政为快。夫济斯民者，唯有王道而已。王道不行，则奈斯民何？是阁下之与弟等所同忧也。宜坚忍待机，以达宿志，至嘱，至嘱！”^③ 这个后来在1939年作了日本内阁

① 郑孝胥：《王道讲演集·王道救世之要义》，1934年（“康德元年”）福文盛印书局出版。

② 同上书，第47—50页。

③ 《日记》，第5册，第2402页。

总理大臣的政客，也是持“王道”立场，把郑孝胥视为亲密同道了。9月23日，上海法文日报主编马兰士向郑询问“王道立国大意”，郑回答说：“国家因种族国际之恶念，以取战祸。今遇水旱天灾，人类好善救济之举，绝无种族国际之意以生分别。而战祸之烈，千万倍于天灾，则残忍不仁，虽同归于尽而不顾。今满洲国既兴，若仍以教战为立国之本旨，则世界更增一战斗之民族，恐不为天道所容。故今日之行王道，即欲消灭种族国际之恶念而已。”^① 对于他这套“理论”，有个日本人宇佐美宽尔表示怀疑，认为“王道不能废兵”。郑回答说：“举世皆知恃兵之危，又疑王道之危，故不能免于战祸。若满洲国实行王道，日本以不去兵而倡王道，则天下之嗜杀者或不能逞矣！”^② 1933年5月18日，他又对日本众议院访问团说：“今满洲国兴，倡言王道，而日本助之，此乃国家道德之联合。苟能以国家道德联合世界，此即与国家道德征服世界何异？诸君为日本全国人民之代表，宜以国家道德自任，此即以国家道德征服世界自任者也。”^③ 他虽然喋喋不休地宣扬“博爱”，要消除种族、国际界限，要以“国家道德”征服世界，但是却不敢说要日本“去兵”。原来他的“王道”是要靠日本的武力保护之下去推行的。就在他大讲战祸如何惨烈，“嗜杀者”如何残忍不仁的时候，他却一再去参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丧命的军人举行的“慰灵祭”；他一再为日本军国主义大举武装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表示“庆贺”。当1935年3月日本攫取了全东北的铁路经营权，“北满铁路协约”签字的时候，他说：“此约之成，为王道之明效。何也？历一年九个月，停而复议，议而复停者数矣。日、苏、满三国之用心，为相争乎？为互让乎？综而言之，非互让不克至此。夫王道以让为本，故日、俄二邦皆可谓之武装之王道，若满洲国，则不过提倡王道而已，而亦获其报。然则，当世列邦，亦

① 《日记》，第5册，第2410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450页。

③ 《日记》，第5册，第2461页。

何惮而不为王道哉!”^① 这就是郑记“王道”的效验! 这就是武装的“王道”和非武装的“王道”的完美结合! 他对“王道”讲得越起劲, 其虚伪丑态也就愈暴露得淋漓尽致。可是他却有些飘飘然、昏昏然忘乎所以了。在 1933 年, 他竟一连五次作起《弭兵说》来了。他说什么“人道不明, 于是谋国者各营其私, 利己损人, 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此兵祸所以日亟, 人类所以日残也”。“呜呼, 恃兵以立国者, 赋敛之重、死亡之忧, 其民不能堪矣!”“立国于今世, 果有不嗜杀人者, 则天下必归之矣, 虽弭兵可也。”又说: “两国相仇, 必务覆其根本, 其破坏唯恐不力, 其范围唯恐不广。飞机毒炮之下, 期于我存彼亡, 或同归于尽, 然后为快。”“时日曷丧之哀, 与汝偕亡之惨, 弥漫于人世之内, 以兵立国者, 其果足以立国乎!”^②

郑孝胥简直成了一个悲天悯人, 反对强权, 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就在他高喊“弭兵”的时候, 穷兵黩武、好战嗜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磨刀霍霍, 不但已经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东北, 而且正准备大举武装侵略华北和全中国, 进而征服全世界。郑氏所诅咒的“以强凌弱”、“利己损人”的“以兵立国者”, 不正是日本帝国吗? 他自己虽然是在宣扬“王道”, 并未想到这会得罪日本主人,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怎么会容忍他的这种理论主张呢! 郑孝胥之所以被日本侵略者抛弃, 是与他这种忘乎所以的宣扬“王道”大有关系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 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初, 为了欺骗国际视听, 以建设“满洲王道乐土”相标榜。这时, 由于郑孝胥的“王道”说教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 因此, 不但容忍而且鼓励他对“王道”大肆赞颂。但是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控制和统治的日益强化, 军国主义的野心和势力日益膨胀, 郑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说教, 就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口味格格不入, 甚至背道而驰了。对此,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作了符合实际的解

① 《日记》, 第 5 册, 第 2576 页。

② 郑孝胥:《王道讲演集·弭兵说》, 第 175、178、199、120 页。

释,他说:“以往,满洲建国的口号是‘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满洲国的政治是行‘王道主义’。而关于‘王道主义’,中国人是按照其固有观念理解,而日本则以自身的立场和利益为前提,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释。”“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时,明确地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一体不可分’关系等口号,……他们取下了在建国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义的招牌,以‘八纮一字’的所谓‘皇道精神’取而代之,……进而排斥王道,最后使之消声匿迹。”^① 其实,在1935年7月间,太田万世雄就向郑孝胥提出:“日本疑王道有‘汤武革命之说,与日本所执‘万世一系’不合。”郑自圆其说地解释道:“三王家天下,故臣子之用心,无不欲万世一系者,能抱德至万世,永无桀、纣之君,则亦非不能也。”^② 此话虽阿谀日本天皇制为“抱德至万世”,但毕竟出于无理诡辩。日本对这位“王道”先生再也不感兴趣了。

把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展到了极度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中,极力提倡和宣扬的是“八纮一字”和“神道精神”。他们供奉的是“天照大神”,而不是孔孟程朱;他们实行的是屠杀中国人为乐为勇的“武士道”,而不是什么“王道”。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的时候,把日本的“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请”到“新京”供奉起来,而把过去称日本为“友邦”也改成了“亲邦”,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已经公开说成了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不过这时郑孝胥已经呜呼哀哉,他所苦心孤诣、舌敝唇焦宣扬的“王道”,也只能成为一种历史的讽刺和笑柄了。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① 前揭书,《伪满傀儡政权》,第188页。

② 《日记》,第5册,第2589页。